# 第一章

# 振翅欲飞的西部少数民族

“寻求局部的突破以求带动整体实力的发展”模式使今天的东部沿海地区，在短短的 20 余年的时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同样是这 20 来年，中国更广袤的西部民族地区依旧被贫困和落后所困扰，在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版块中被列为“欠发展地区”。但就是这些“欠发展地区”恰恰既是我国工业化的资源后方，又是我国国防的战略前线。西部开发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西部开发此其时也！西部民族地区开发此其时也！！

# 第一节　西部民族地区概况

西部民族地区在文人心中，是大漠，是草原，是粗犷的民俗民风，是雪山深处升起的一轮明月；在创业者心中，是落后的，是贫困的，是一块空旷的土地，是一片寂寥冷清的城市与乡村……以地理学的概念来诠释，西部民族地区，就是指西部地区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它包括 3 大自治区，即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6 个多民族省（市），即甘肃、青海、四川、贵州、云南和重庆（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人们习惯上将内蒙和广西亦划归西部地区）。在全国的总面积中，西部地区约占 55%左右，而少数民族分布区则又占了西部地区面积的 80% 以上。西部民族地区在全国总面积中，也占有 40% 以上；在全国少数民族分布地区中，则占有 60% 以上。从密集度看，西北又是中国西部地区最主要的多民族聚居区域和我国少数民族聚居面积最广的地区。西北地区县以上的民族自治地方（不含自治州的自治县）总面积为 260.5 万平方公里，占西北地区面积的 84%，其中青海省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面积竟占了全省面积的 98.29% 。在西北地区人口中有近 50 个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人口 1477.07 万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 20%。而青海的少数民族比例达 57.5% ，新疆达 61.9% ，包括维吾尔、回、藏、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东乡、锡伯、俄罗斯、乌孜别克等 18 个民族，且已形成大小不同的聚居区，是大西北主要的少数民族。西北地区还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接

壤，其边境全部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面积有 57 万平方公里，居住的少数民族人口占边境地区总人口的 66%，占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 18%左右，全部边境线长达 5600 公里。

西南地区大约有 3 亿人口，其中少数民族 4000 多万，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一半以上。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与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等国接壤，国境线长达 3500 多公里，是西南的重要门户。全区面积为 122.84 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藏族占全区人口的 90%以上。贵州、云南、四川、重庆都是多民族聚居的省市。贵州主要有苗、布依、侗、彝、水、仡佬、土家等 12 个民族，人口 750 万，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1/3；云南有 46 个民族，人口在 4000 人以上的民族有彝、白、哈尼、壮、傣、苗、纳西、景颇、阿昌等 24 个，少数民族人口计 1000 多万人，占全省人口的 1/3，全省 128 个县，没有一个县是单一民族。

与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其他地区相比，西部民族地区无疑是贫困的。但同时，西部民族地区又由于拥有充裕的资源而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开发潜力巨大，从这一点上说，它又是极其富饶的。不难看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一是它的多民族性。数十种民族的经济交织在一起，这与其民族成分多、分布广且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特点是相适应的。二是它的落后性。绝大部分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下，不少地区还没有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无论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是人均消费水平，西部民族地区不仅与东部比有很大差距，而且与全国平均水平比也有很大差距。如基尼系数（最低收入人群占总体人数的比重）全国平均为 30%，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平均为 50%，有些地方高达 75%。恩格尔系数（每百元生活费支出中，食品支出占的比重）全国平均为 54%，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平均为 67%，有些地方高达 80%。文盲半文盲率全国平均为 22%，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平均为 41%，有些地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高达 70%以上。形成这些基本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是由于大多数的西部少数民族一般居住在远离城市的河之首、山之巅、林之间、疆之边，地区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长期闭塞。农业生产力低下，工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不发达，基础设施相当落后，教育科技水平低，劳动者素质差，城市化程度不高，市场经济发展缓慢。三是它的不平衡性。经济与社会发展差距极大，大中城市水平较高，边远地区水平较低，就整体发展水平而言，无论是在地区之内（西部地带）比，还是与地区之外相比，不平衡性都十分显著与突出。四是它的资源非常丰富。①有别具特色的土地生物资源。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宜农耕地面积约 2 亿亩，占全国的 9%，占西北地区的 60%，其中耕地面积约 6700 万亩，占西北地区的 40%；草原面积约 20 亿亩，其中可利用的草原面积 13 亿亩，分别占全国的 41%和 38%。西部民族地区，因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各异，生物物种资源丰富为国内少有，如秦巴山区的太白梅花草、独叶草、七叶一支花，青藏高原的冬虫夏草、藏红花、天山雪莲等；同时，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是国宝大熊猫的故乡；青藏高原有野牦牛、藏羚、白唇鹿、雪豹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青海湖的鸟岛则是我国西部内陆地区最大鸟类栖息地，有黑颈鹤等珍禽；新疆帕米尔高原地区和天山、阿尔泰山等地有马鹿、棕熊、松鸡、盘羊等珍禽异兽。这些珍禽异兽与奇花异草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②有品种较齐全集中、蕴藏量大的矿产资源和能源。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的能源、矿产资源的拥有量（保有储量）占西北地区的比重分别为：石油 95%，煤 35%，油页岩 42%，盐矿 99%，有色金属 11%，铁、钛等黑色金属 39%。其他如石膏、石棉、白云母、磷矿、硫铁矿的储量也十分丰富，西北各民族省区拥有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是：宁夏为第五位，新疆为第八位，甘肃为第十五位，青海为第十六位。西北民族地区能源生产不仅占有量高，而且聚集也较

为集中。例如，煤炭主要分布在陕北——宁东一带、新疆的天山南北麓；石油、天然气主要分布在陕甘宁的毗邻地区，青海柴达木盆地和新疆的准噶尔、塔里木等地区。甘肃是有名的“有色金属之乡”。西南民族地区的能源矿产资源同样极为丰富。以水利资源来说，西南民族地区处于长江和珠江流域之间的上游地带，可开发水能蕴藏量分别为长江和珠江全流域的 69%和 82%，合计为 1.7亿千瓦，相当于全国水能蕴藏量的 51%，可开发水能年发电量相当于每年 3.5 亿吨标准煤；就矿产资源而言，西南民族地区拥有世界已知 150 多种矿产中的 2/3 以上。其中，汞、铅、锌、铜等都列全国前三名。磷矿、铁矿（与钒、钛共生）更是列全国首位。富集的自然资源，使西部民族地区成为我国工业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后方，必将对振兴民族地区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缩小东西差距具有重要意义。③有饱含浓郁民族风情的旅游资源。西北民族地区历史悠久，地貌复杂多变，从而形成了得天独厚、丰富灿烂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有巍峨的昆仑山，风景幽深的甘肃平凉崆峒山。有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河流域，即著名的疏勒河、塔里木河和伊犁河等流域。其山水地貌千姿百态，既有浩瀚戈壁沙漠，又有新开辟的草原绿洲；既有山清水秀的江南景致，又有银妆素裹的北国风光；更有那著名的“天上明珠”——天池，在古书《穆天子传》的神话描写中，被当作是西王母宴请周穆王的昆仑仙境“瑶池”，景色优美，令人神往。作为中华民族及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西北民族地区的人文旅游资源也异常丰富，实际上是一座中华文明进展的“天然历史博物馆”和“民族风俗博物馆”。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嘉峪关古长城等都反映了大西北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青海塔尔寺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是中国藏传佛教 6 大寺院之一，寺内藏有多种藏文经典，为研究明朝时青藏高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提供了大批文物史料。宁夏的海宝塔，迄今相传已有

1500 多年历史，此塔建筑风格很是独特，给人以玲珑精巧、层次分明之感，是中国古塔中的珍品。西北民族地区尤为引人注目的还有以“丝绸之路”为纽带所形成的人文旅游景观。古“丝绸之路”横贯新疆，途经高昌古城、交河古城、楼兰古城遗址、龟兹都城遗址等古迹，人文风格独特，历史底蕴丰厚，是不少中外游客心驰神往的地方。西南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同样是多姿多彩的，西南地区宜人的气候，诗画般的自然风光和绚丽多彩的民风民情，构成一幅美丽动人的画卷。这里有“人间仙境”黄龙寺——九寨沟风光、神秘奇妙的泸沽湖女儿国、还有令人流连忘返的傣族泼水节、梵净山下苗家山寨的民族传统节日和风土习俗。近年来西藏更成了一大旅游热点，以其独特的地形、地貌、草原、湖泊、冰川、峡谷及多种原始森林和独特的气象、环境条件，为旅游者提供了瑰丽的自然风光，其人文景观富含雪域风情，包括藏传佛教、寺庙建筑、岩画和古代文化遗址及藏族与其他民族的歌舞、音乐、服饰艺术等，许多旅游点，如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等地，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部民族地区极具独有的阳刚之美、富庶之美。从遥远的古代到火热的当代，中国的西部包括西部民族地区都以其博大的胸怀吸引创业者前往，去开垦、去拓荒、去建设。

西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曾是中华文明的重心，也是众多民族生息繁衍之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中谱写下数不胜数的可歌可泣的诗篇，日渐形成了团结进步的西部民族大家庭。

直到解放前夕，我国各少数民族尤其是西部民族仍处于封建领主制、奴隶制和原始社会末期，山川残破，民生凋敝，各族人民痛苦不堪。概括起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有以下几种经济形态：在回、维吾尔、苗、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比较发

达，有的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藏、傣、哈尼等民族地区，存在着领主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农奴制度。在云南、四川交界的大小凉山的彝族地区，还存在着较为完整的奴隶制经济。在云南边疆地区的独龙、怒、佤、傈僳、布朗、景颇、基诺等民族地区虽然已经出现了土地私有和剥削，基本进入阶级社会，但是还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在政治制度方面，也比较复杂。西藏地区存在着典型的“政教合一”制度，即僧侣贵族的联合专政制度。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回等民族中尚存在着宗教法庭或门宦制度。四川、云南、贵州、青海和甘肃等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着土司头人制度、山官制度。在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则有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支”制度，黑彝家支对奴隶实行专政。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制度和反动的政治制度，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再加上国内外统治阶级的压榨、掠夺，使广大人民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西部少数民族这种悲惨的境遇，直到新中国的诞生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国家空前的大统一和 50 多个民族的大团结，也标志着我国国内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族压迫剥削的时代从此结束，全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共同发展的新时代由此开始。党和国家带领各族人民推翻了各种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完成了向社会主义制度的飞跃，实现了民族平等，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然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基础太差，底子太薄，虽然社会制度的变革可以一日跨千年，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却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东部地区已基本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步，且离第二步为期不远。而对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尽管也有发展，但与东部相比发展速度较慢，第一步尚未基本实现，第二步方始起步。因此，它既需要解决生存问题以脱贫，又需要解决发展问题以致富。双重任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双重困难。所以，从中国大局看，加快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速度和加强开发力度，已刻不容缓，当前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乃英明之举。

# 第二节　　历史回放

## 一、少数民族开发了西部边疆的广大地域

祖国的西部边陲，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又是国防要地，绝大部分是居住在那里的少数民族开发的，这在客观上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西部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 1. 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开发

我国西北的新疆地区，是由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柯尔克孜和锡伯等民族的祖先开发的。自商周以来，居住在天山南北的各民族为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矿产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龟兹盛产稻、粟、菽、麦、麻。焉耆产黍、葡萄。轮台以东有灌溉田50万亩以上。据《水经注》所载，敦煌人索励带兵千余人至伊循城屯田时，曾在焉耆、龟兹（今库车、拜城）等国兵士三四千人的帮助下，把发源于昆仑山的注宾河（卡墙河）巨流切断，掘渠分水，灌溉农田，许多瘠土于是变成了沃壤，不过三年，就积粟百万石。姑墨（今拜城一带）产铜，羌和莎车产铁，于阗产玉，这在汉代就已有记载。在南北朝时，龟兹就是一座冶铁手工业基地，史载：“屈

茨（即龟兹）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唐宋时居住在这些地区的西北回鹘人（后称“畏兀儿”，今维吾尔族的先民），大力开导水源，灌溉田亩，又利用水力，造作水碾，加以“厥土良沃，麦一岁再熟”。手工业、商业也有显著的发展。清代，维吾尔族进一步开发了新疆，据《新疆图志》对 28 个县的统计，从公元 1883 年以后，整修、新修灌溉干渠近 1000 条，支渠 2000 多条，灌溉面积达到 1000 多万亩。他们种桑养蚕，从 1883 年到清末，南疆一带年产蚕丝由 30 万斤增至 70 多万斤。从东北移居新疆伊犁的锡伯族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修渠、开荒、建立家园。 1802 年，在察布查尔山口引水，自崖上开凿大渠，经过 6 年的努力，终于引来伊犁河水。锡伯族人将这条长达 200 里的大渠命名为“察布查尔”，（锡伯语：粮食之意。）以喻其灌溉的肥田沃土丰产丰收，取用不竭。后来，锡伯族人民引伊犁河上游之水，修成了皇渠，在博尔塔拉开凿了哈尔博户大渠，在塔尔巴哈台开凿了河布德拉大渠，从而使这一带原来荒芜的土地有了充足的水源而得以大量垦殖。

## 2. 对青藏高原的开发

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是藏族人民生息繁衍的地方。西藏林芝、定日、卡若等地的多项考古发掘结果说明，距今 4000 年～20000 年前，中华民族的远古先民在高原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藏族先民吐蕃人就在这里兴修城廓、开荒种地、牧养牲畜，发展了农牧业生产。吐蕃开发的农业区大部分在藏南河谷地带，农作物以青稞、小麦、荞麦、豆类为主。在松赞干布时已“开拓荒地，划分良田牧场”，即畜牧业和农业分工，分别发展。这比单纯的游牧已有很大进步。社会上已有专业的冶铁、硝皮等手工业匠人，能用铁制造各种兵器，已掌握了淬火和磨砺的

技术。后来，吐蕃在云南漾、濞两条江河上架起了铁索桥，沟通两岸交通，证明吐蕃的冶铁和架桥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松赞干布时期始建布达拉宫、大昭寺和小昭寺，显赫中外的高原名城从此逐步形成。元明时期青藏高原的开发又前进了一步，特别是藏区通往祖国内地的驿路、桥梁和其他道路，得以大加整修。在宽阔的雅鲁藏布江上，曾建起多座大型的铁索桥，沟通两岸往来。明代，在青海、甘肃、四川藏区设置了若干卫所，藏汉人民和军队共同开荒种地，小麦、粟米连年丰收，粮价因此下降。在川西鱼通（今四川康定一带），当地藏族已种植“水陆田”，估计这是一种可以灌溉的旱地。青海地区则广为兴建“城廓庐室”。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交换。当时，以茶、马为主，包括内地绸缎、布匹和藏族的畜产、土产的交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和密切的程度。河州、洮州、雅州、黎州等地，都成了这一时期藏汉民族贸易的重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的兴盛，建筑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城堡和寺庙鳞次栉比，雄伟美观，绘画、雕刻有了惊人的成就。青藏高原就这样一步步开发出来了。

### 3. 对云南边疆地区的开发

云南地区，最早是由彝族、白族、傣族、哈尼、景颇和傈僳等少数民族的先民开发的。自古以来，云南就是各族人民生息、繁衍、劳动的地方。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也曾“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西汉时，农耕已成为当地的主要生产部门，畜牧业也比较发达。滇越族在云南西部垦田农作，种植水稻，是云南种植水稻最早的民族。“滇国”中的僰人就在滇池周围的平坝地区开垦出了“肥沃数千里”的耕地，利用“千顷地”灌溉种稻，规模已不算小，生产水平已接近中原。牲畜饲养也大力发展，公元 109 年汉武帝派兵征服“滇国”时，便从滇国获得“牛马养属三十万”，可见其牲畜

数量之多。这时的滇人、昆明夷和汉族在一起，开山劈岭，修筑了许多栈道。据载汉朝初年，自关中地区（今陕西）经巴蜀而达于滇中，“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而且开辟了通往缅甸、印度等国的交通路线（这就是今日学者们正在考察研究的南方丝绸之路），加强了和外国的友好往来和贸易联系。隋唐之后，云南地区居住的“白蛮”和“乌蛮”进一步开发的边疆，已是一个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物产比较富饶的地区。滇池西的“安宁雄镇”是当时著名的盐产地，商业也很发达，姚州、昆州、步头等城镇都很繁荣。金齿和银齿（傣族的先民），在西双版纳、德宏一带“养象以耕田”，普遍使用犁耕，引水灌溉农田，他们善种棉，织出的“婆罗布”享有盛名。分布在红河两岸的哈尼族，善修梯田。公元 7 世纪以后，今云南昆明、大理、巍山等广大地域建立了包括彝族、白族、纳西、傈僳等族在内的“南诏”和“大理”两个地方政权，把云南地区的建设又推进了一大步，出现了太和城（今大理县南）、苴咩城（今大理）、拓东城（今昆明）等一批重要城镇。到清代，彝、白、傣、汉各族人民大力垦殖农田，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从顺治十八年（1661 年）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 150 多年中，汉平坝地区的田地就增加了 410 多万亩，比原有数增加了一半以上。至于山区，清代更采取了“计户纳粮，免其查丈”的办法，“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无荒芜之壤”。开垦的土地也不少。特别是包谷和洋芋的引进种植，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

## 二、少数民族推动了古代西部经济的发展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西部各民族在其活动的区域内进行开拓和经营，推动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 1. 西部少数民族与畜牧经济

畜牧经济是古代西部少数民族主要的生产方式之一。这种古老的生产方式成为活动在青藏高原、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的民族经济活动的主体。这些民族逐水草而居，进行流动性极强的牧业生产。牛、羊、马、驼成为他们衣（毛皮）食（肉、乳）的主要来源。居于西域地区的乌孙族，在张骞通西域时，其畜牧业就已发达，兼营狩猎，不务农耕。养马业特别繁盛，富人畜马有多至一户达四五千匹的。在日常生活上，住穹庐、食肉饮酪，与“匈奴同俗”。在西汉设立河西四郡之前，河西走廊是西北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如氐羌、大月氏和乌孙等的范围。早期的河西地区有大量的绿洲点缀其间，五大河流自北向南贯穿整个地区。地下水资源丰富，水草肥美，特别适合畜牧业的发展，南界的祁连山更是上好的天然牧场。据史料记载，月氏在河西时，畜牧业已经相当发达了。但当时正处于“随畜移徙”，逐水草而居。隋文帝开皇十九年，启民可汗自言突厥人的羊马“遍满山谷”。熟悉突厥情况的唐朝使臣郑元铸说：“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说明了突厥族畜牧业之繁荣和重要。唐初，由于长期战乱初平，中原地区“民乏耕牛”，突厥人卖给唐朝大量牲畜，解决了中原生产生活之急需。唐朝每年用于交换马匹的丝帛即达数十万匹之多。唐宋时的“乌蛮”和“白蛮”养殖的“大理马”、藏族培育的河曲马、青藏高原的牦牛都是著名的畜种。清代西藏的经济中，畜牧业是最重要的产业。

畜牧经济是封建社会中西部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北少数民族经济活动的主线。西部少数民族所创造的畜牧经济和草原文化是我国古代西部整个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 2. 西部少数民族与农耕经济

秦汉时，在今新疆塔里木盆地周围和天山北麓一些地方，分布着奴隶制城邦政权——“城廓诸国”或“西域三十六国”。他们主要从事农业，也兼营畜牧业，所生产的农作物相当丰富。粮食作物有大麦、小麦、黍、稷、菽等。此外还盛产葡萄、苜蓿、石榴及其他瓜果、药材等。据《宋史》记载，公元 10 世纪～11 世纪，居住在吐鲁番盆地一带的“回鹘”等族，农业生产已很繁盛，“地产五谷”，“有水源出金岭，导之周围国城，以溉田园”，并作“水碾”以代替人力杵臼，说明灌溉事业也已有相当水平。在今云南地区，汉朝时，哀牢夷已能种植“五谷”，营“蚕桑”，滇族在滇池一带开通灌渠，被誉为“有盐池、田、鱼之饶，金银、畜产之富”。隋唐时的金齿、银齿等族在今西双版纳、德宏一带，养象作为畜力耕田，已普遍使用犁耕。唐宋之际的乌蛮、白蛮等族在苍山、大理、滇池等地兴修了很多蓄水池和水利灌溉工程。大理地区的“横渠道”、“锦浪江”水利工程，引导十八溪的水浇灌了整个大理坝下的万顷良田。农业生产技术已接近中原地区的水平，一时间“居民辏集，禾麻蔽野。”就连形成较晚，以善经商而兼事农牧业的回族，明清时的农业生产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宁夏地区，他们和汉族一道兴修了大清渠、惠农渠、七星渠等许多水渠，开垦了大片农田，发展了水利灌溉事业。“塞上天府”、“塞外江南”、“黄河万里富宁夏”的赞誉，就是历史上回汉人民利用黄河水利，开发黄土高原，并同河崩沙压、湖坑碱滩等不利的自然条件进行顽强斗争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见证。西藏高原上的吐蕃 7 世纪初在松赞干布建立统一政权后社会出现了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局面，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敦煌·藏文文书》记载，当时雅鲁藏布江两岸，牛羊遍野，农田弥望。在藏南河谷的农业区，已有青稞、麦、豆等作物，耕作技术上已使用铁犁

和“二牛抬杠”式的犁耕，并有了专用的水利灌溉系统。到公元9世纪初，农民已知薅草积肥。这都反映出农业生产具有相当的水平。

西部各少数民族除了在自己居住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繁荣经济以外，还对中原地区的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原地区输送了许多作物品种和传授了栽培技术。如高粱、玉米、芝麻、蚕豆（胡豆）、葡萄、核桃（胡桃）、红萝卜（胡萝卜）、西瓜等，都是先后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从西域传入的。新疆地区种植棉花的历史比中原要早五六百年。

## 3. 西部少数民族与手工业和商业贸易

西部少数民族手工业颇具特色，对全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早在汉代已经出现与农牧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如酿酒、制玉及铜、铁、银等金属冶炼加工，有的还比较发达。当时龟兹产的铁，足以供给西域“三十六国”之用。随着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交换也开始兴盛起来。远在秦统一六国之前，西域和中原地区就有商旅往来。汉武帝开边之后，西域正式纳入汉王朝的版图。昔日东西之间的商道得以巩固和发展，渐渐形成了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繁荣起来的。由此可知新疆很早就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到了唐宋时期，今维吾尔族的先民“回鹘”的手工业已较发达，享有“性工巧，善冶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善织先丝”（用五色线织成的布）的美誉。明、清之际，维吾尔族的铁器制造、丝棉纺织、皮革、木器、油漆以及玉石雕刻、造币等手工业更有相当的发展。此时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各族的商业已兴盛起来，一些地方已形成定期的“巴札”（集市），有的“巴札”规模已很可观，市场竟连绵10里。著名的城镇如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哈密已初具规模，当时是“商贾云集，百货俱备，居

然一大都会”。南疆的阿克苏，因北通伊犁、南达喀什、叶城，东通吐鲁番，所以各地商人汇合。另一重镇叶尔羌，经常有外地客商远道而来，“而外藩之人，如安集延，退摆持（今拉达克）、克什米尔等处皆来贸易，每当会期，货者云屯，人如蜂聚，珍奇异宝，往往有之，牲畜果品，尤不可枚举。”宋元时期，云南大理一带的白族锻打的“大理刀”，芒刃不钝，成为大理政权与内地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商业贸易也很活跃，当时输入内地的商品主要有牲畜、刀、毡、甲胄、漆器、麝香、药材等，从内地输入的有汉文书籍、缯帛、瓷器、沉香及奇巧的手工艺品等。早在南诏时期（公元八九世纪）就形成的贸易集镇苴咩（大理）、拓东（昆明）、永昌（保山）、银生（景谷至西双版纳附近）等，此时又有了较大的发展。银生和永昌已成为我国与南亚乃至更远地区贸易的重镇。

回族人民向来以多能工巧匠和善经商而闻名于世。明清时代，回族的手工业有了较快发展，著名的有：与传统商业相结合的制香料业，与传统医学相结合的制药业，著名的北京王回回膏药和马思远药锭都是从明代开始的。从元代开始，回族商人已活跃于全国各地的大城市。元朝大都北京和东南沿海的杭州、泉州、广州等城市都是他们经商的据点。香药、明珠和宝货是他们的主要商品。另外，回族从事海外贸易和交往的贡献相当大，闻名世界的航海家云南昆明人郑和就是杰出的代表。他七下“西洋”的空前壮举，促进了中外交通、国际文化交流和中国沿海居民的海外活动。

商业贸易的发展也是古代西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沟通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发展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起了重大作用。

# 三、中国历代王朝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开发治理

为了加强对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管辖，历代统治者都先后对西部民族地区进行了开发和治理，在客观上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西部民族大家庭的巩固。

## 1. 移民实边

“移民实边”是指历史上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密集地区的人口向人烟稀少、土地荒僻的边疆地区迁徙，和当地各族人民共同开疆拓土、发展经济、保家卫国的实践活动，类似现代意义上的“移民”。大规模的移民开发始于秦朝，而两汉在秦的基础上，更加大了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开发力度，尤以西汉武帝时最盛。他利用士兵和中原地区的迁徙人口，在西域、河西等边疆地区垦荒种田（屯田），以取得驻军的给养和税粮，从而形成自给自足的屯垦型农耕经济。它服务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军事政治，但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地区农耕文明向西部民族地区的扩展，促进了民族地区生产方式的进步和农业的开发。自汉武帝后，屯田制度皆为历代王朝所沿袭。

唐代屯田组织之完备，屯城之广，田亩之多，历史空前，屯田收入便大体解决了西部边防军粮问题，无疑在经济方面为唐在西部民族地区大量驻军提供了重要保障。明代的移民屯田政策进一步制度化，同时又首创了商屯之法。其办法是：明王朝召盐商运粮到指定的地点，换取国家专营盐场的“盐引”，盐商凭“盐引”提取食盐后，自由贩卖，从中获利。后来盐商觉得长途运粮劳苦且获利不大，于是用金钱召募内地的农民，到边疆主要是西部边疆地区开垦屯种，以收获粮食就地交纳，换取“盐引”。由于明朝的号召和鼓励，西部边疆地区出现了屯垦热潮，大大加快了其经济发展步伐。大批内地

移民到少数民族地区后，带去了相对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和农作物品种。此外，由于移民中不仅有农民，还有医生、技术工匠等，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也起了特殊的作用。

清初从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即："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事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所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加强边防。清朝统一新疆之后，按照乾隆帝"武定功成，农政宜举"的方针，对新疆地区进行经济开发，在全疆范围内大力推行各类形式的屯田制度。清代的屯田有兵屯（绿营兵）、旗屯（八旗）、回屯（维吾尔族）、遣屯（流犯）、民屯（内地移民）、商屯（内地商贾）等形式。到乾隆四十二年左右，兵屯、遣屯达 28.7 万余亩，民屯也达 28 万余亩，有力地促进了新疆经济的迅速发展。清代主要是采取鼓励内地居民自发迁往地旷人稀的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垦荒，并给以扶持的政策，数年后，河西绿洲出现了"户有盖藏、民乐安宅"的升平景象。

移民屯田客观上促进了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其历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完全可以这样说，古代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农业及科学文化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艰苦的西部民族地区开发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移民史。

### 2. 贡赐

贡赐是封建王朝对朝贡臣服中央政府的边远少数民族特别给以丰厚的经济赏赐，向边疆民族经济"输血"的一种特殊补偿性贸易。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促进中原地区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交流，中国历代王朝都实行了贡赐制，规定凡接受中央王朝官职和封号的少数民族首领，必须按期率众入朝进贡，贡品多为珍宝和土特产，贡使随带的商品还可以出卖。朝贡政策早在先秦之时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